

中国邮史通览
(二)

沈阳市集邮协会

第二篇 中国近代邮政史

第一章 太平天国通信

公元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侵略者以武力打开了中国长期闭关自守的大门，使中国长期封建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近代邮政也就在中国土地上曲折地生长起来。

当时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打破了中国古老的封建主义文化传统，“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成为先进中国人的活动。太平天国领袖之一洪仁玕在《资政新编》里提出学资本主义文化、科技以及革新政治的主张，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并拟定了开办近代邮政的规划。这个规划由于太平天国的失败而没能实现，但洪仁玕的主张自有邮政，揭开了中国近代邮政史的新篇章。

第一节 疏附衙——太平天国驿站

(一) 行军通信

公元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发动起义，正式宣布成立太平天国。起义军由广西经湖南北上。在行军途中，制定了《太平条规》，其中《定营规条十要》中第六条为“要谙熟日夜建兵鸣锣吹角擂鼓号令”。这是行军中联络信号。

(二) 迎敌旗号

当太平军占领武汉三镇时，为迎击清军反攻，于“黄鹤山脊起望楼，高数丈”，瞭望敌情。公元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占领南京后改为天京，设望楼，高五丈，分三层，设大鼓一面，派五人看守，以色旗为号：东西南北束兵入侵，分别举青、白、红、黑旗。派兵拒敌则用黄旗，同时吹螺击鼓为进军号令。

(三) 作战信号

击鼓分为九通：一通鼓——城外吹角报警时，击一通鼓作好准备；二通鼓——集合听令；三通鼓——遵令出发；四通鼓——各馆牌尾并各书使起身奋战；五、六通鼓——同二、三通鼓办法；七通鼓——各馆女兵出战；八、九通鼓——同二、三通鼓办法。

(四) 传递军情

远方通信则派专人带密信化装越过敌人防线。密信藏在雨伞柄里、衣夹层里等。历尽艰险，传递军情文报。

(五) 通信机构

为了在天京调度各地军队，运输，递送公文，建立起通信机构——疏附衙。由朝内疏附官主持全国通信工作。正疏附衙设在天京，由聂光先主管、张万顺为副主管。在各地部队中设军中疏附官，各地设疏附衙。每隔三、五十里设一个疏附衙，每衙有军官一人，士兵二、三十人驻守，负责通信工作。各衙建有来去文簿，收发公文登记，定期检查。公文及

信件附有递文路程单（如清末的排单），注明公文所经路线和到达地，由各疏附衙标上收、转日期与时间。并建有“火牌”制度，附有火牌的公文，必须按时送到，否则军法论处。

报递路线：一是从天京到武汉，二是经瓜州、镇江到苏州，分别通往江苏、安徽、湖北、江西等地。

交通工具：八桨快船和快马。以水路为主，船上挂黄旗，上写“天朝疏附”或“监军疏附”字样。下水顺风日行二百四十里，上水顺风日行一百里。陆路则用快马，平常文件日行百里。紧急公文在封套上加盖木制云马园戳，中间刻有翅飞马，周围刻云，戳上端刻发文将领官衔，如“忠王发”、“保天安发”等。每一时辰需飞驰五十里，称“云马文书”。陈庆甲在《金陵纪事诗》写道：

剩瓦颓垣驿路斜，文书一驾去来除；

封头紧急加园马，忙煞当差疏附衙。

太平天国通信主要是军邮，从望楼、鸣锣、吹角、击鼓、举旗为通信号令外，发展成为专人传信与正式设立专门通信机关——疏附衙。

第二节 邮政规划

（一）洪仁玕提出治国方略——《资政新篇》

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于公元1843年参加了拜上帝会农民起义组织。公元1851年金田起义后，他赶去广西浔州（今桂平）找太平军不遇，便赴香港居住，并到过上海，直到公元1858年6月才由香港到广州，于公元1859年4月

来到天京。

公元1859年5月11日，洪秀全封洪仁玕为“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负责总理朝政重任。他于公元1859年著有《资政新篇》，提出治国方略，其中包括对邮政通信的设想与规划。

（二） 设置书信馆传递民情，引进现代交通工具运邮

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提出设置书信馆作为通信机关。他说：

“以法法之者，其事大关世道人心，……则宜立法以为准焉……如设书信馆以通各省郡县市镇公文，设新闻馆，以服民心公议……皆借此行其教也……”（《交通史邮政编》第四册1339页）

他主张引进现代化交通工具，传递邮件。他在同书中又说：

“兴车引之利，以便利轻捷为妙，倘有能造如外邦火车，一日夜能行七八千里者，准其自专其利，限满准他人仿做，……先于二十一省，通二十一条大路，以为全国之脉络，通则国家无病焉……，二十里立一书信馆，愿为者请饷而设，以为四方耳目之便，不致上下梗塞，君民不通也。”（《太平天国史料》39页）

（三） 设置邮亭传递公文，严密交接手续

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提倡设置邮亭，传递公文，严密交接手续。他说：

“兴邮亭以通朝廷文书，书信馆以通各色家信，新闻馆以报时事常变，物价低昂。只须实写，勿着一字浮文。倘有沈没书札银信，及伪造新闻者，轻则罚，重则罪。邮亭由国而立，余准富民纳餉，禀明而设。”（《太平天国史料》40页）

“信资计文书轻重，每二十里核钱若干而收。其书要在某处交递者，车上车下，各先束成一捆，至即互相交讫，不能停车俄顷。因用火用气用风之力太猛也。虽三四千里之遥，亦可朝发夕至。纵有小寇窃发，岂能漏网乎。”（同上书39页）

这两段文字说明邮亭与书信馆分工，前者送公文，后者传家书，丢失书信受罚治罪，交接要认真，邮运要快，制度严密，盗窃邮件会漏网的。

洪仁玕关于设立书信馆、邮亭等邮政通信的主张，得到洪秀全的支持，批为“此策是也。”不过由于处于战争年代，来不及实行，但在中国近代邮政史上却有重要意义，这是中国人提出自办近代邮政的主张，很有见地。

第三节 战时通信

太平军从公元1851年金田起义，到公元1868年失败，在长达18年战斗中，邮政通信遍及18省与清军和外国侵略者的对战争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太平军的失败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一） 通信中断清军失利

太平军向长江流域进军，受到清军追击与堵截，由于清

军联络员被太平军抓获，掌握军事情报，向清军伏击，使清军“文武弃城远避，兵勇闻风先散”，太平军则顺利攻占了南京。

公元1853年3月太平军发动第一次西征，清军统帅曾国藩坐困南昌，“呼救无从”，只好“雇募长发探卒，蜡丸细字，作为隐语，以通消息”（见《曾文正公全集》）。但这种被雇的探卒传递情报，常被太平军抓获，“为贼（太平军）逻获，其不达者十之四五焉”，使曾国藩处于失利地位，只因通信联络中断所造成被动局面。

（二） 孤军深入信息难通

太平军从公元1853年5月8日由江苏扬州北伐，6月27日在河南汜水渡过黄河，先入山西，再到直隶，路过赵州、蒿城、晋州、保定、深州，10月27日占领沧州，29日占领天津附近的静海县和独流镇，前锋到达杨柳青。当时吓得“北京官民逃迁者达三万户”，眼看就攻占北京了，但由于太平军与天京通信被清军截断，造成军粮援军难达，苦战二年被迫退到山东而于公元1855年5月失败。

（三） 南北两路信息不通

太平军在公元1860年5月于天京开军事会议，洪秀全决定第二次西征。计划分两路挺进与武昌会师：一路由英王陈玉成带队，由江北前进；另一路由忠王李秀成带队，由江南挺进。当北路军于公元1861年3月18日攻占黄州（今湖北黄冈）后，曾国藩认为危在旦夕，但南路军没按计划到达。当时外国侵略军从中破坏，英国驻汉口领事馆参赞巴夏礼去黄州府求见陈玉成，领事金执尔去兴国州（今湖北阳新）求见李秀

成，他们一致要求太平军“远离武汉”。此时南路军与北路军联系信交由金执尔转交，于被扣而中断了信息，致使西征失败。

（四） 信息不通壮烈牺牲

公元1861年9月，太平军在安徽军事重镇安庆、桐城、池州府（今贵池）相继失守。英王陈玉成派陈得才等远征西北，“广招兵马，早复皖省”，自己坐镇庐州（今合肥），“进兵取粮”支援天京。当陈得才带兵于公元1862年1月刚走，洪秀全下令陈玉成、陈得才等进兵取粮。同年2月15日陈玉成致书陈得才，命令他们赶快带兵前来正阳关。可是陈得才早进入河南。于是2月23日清军多隆阿进逼庐州，陈玉成再次发信给陈得才叫前来支援。3月陈玉成又向捻军张洛行和常州太平军陈坤书等求援，均被清军把信截获。当陈得才于1862年4月17日进入陕西后，才知庐州吃紧，班师回河南，困守庐州的陈玉成由于信息不通，孤军无援，失陷庐州，突围被捕，壮烈牺牲。

（五） 信息不通天京沦陷

太平军据守的安庆与庐州先后于公元1861年9月5日与公元1862年5月13日被清军占领，天京第三次被围。清军与英法侵略者相勾结，从公元1862年3月组成“洋枪队”（又叫“常胜军”）由英人戈登当统带，从水路四面进攻苏州切断交通线。当苏州告急时，李秀成带兵于公元1863年9月从天京出发增援，并于10月28日、11月1日先后致书常州陈坤书并进会师同解苏州之危。11月10日李秀成又致书陈书坤和无锡黄

子隆，请速增援。但这些信件均被清军截获。结果，苏州于公元1863年12月4日失守，杭州于元公1864年3月31日失守。至此，天京外围只剩下常州一个据点了。陈坤书坚持战斗，最后壮烈牺牲。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终于在公元1864年7月19日被清军攻陷。

由此可见太平天国革命取胜有赖于截获清军通信，失败则是通信被清军所切断，通信工作在军事上的成败有重大影响。

第二章 大清邮政成立前

第一节 大清邮政创办前的混乱局面

大清邮政创办前，全国通信机构处于复杂混乱局面。当时除了海关邮局外，还有“海关拨驷达局”，“华洋书信馆”；外国侵入的“客邮”和商埠邮局，还有租界当局、洋商、投机分子等办的“本地邮局”、“书信馆”，有商办的民信局和为侨胞服务的侨批局；有官办的古老驿站和鸦片战争后出现的官办文报局。这些五花八门又自成系统的通信机构，各自为政，没有统一领导，对近代邮政的发展，对赫德在大清邮政中的统治地位，大为不利。因此，赫德在出任总邮政司之前就说过：

“对现有各种通信机构，应当尽可能少加干涉。干涉或不干涉的程度，应以大清邮政能不能接替这些机构目前所担任的工作来衡量。”（见1897年2月13日总税务司赫德第28号通令的附件）

赫德为谋取中国邮权与中国海关税务司英人葛显礼共谋，以“开办国家邮政，可以限制客邮”为借口，大造舆论。他说：

“美国驻汉口代理领事克宁汉，是旗昌公司的代理人，他最近被日本政府派为日本在汉口的邮政代办”，“是一种不合理的特权，中国当局应当予以纠正。”

“中国虽然久已有了很好的驿递制度，但是不替商人带信件，因此商人只好通过私营企业传递信件，这种传递信件的办法迟缓，不经常，花钱多，而且不可靠。”

“中国过去已经仿行了西方的许多新政，例如造船厂和兵工厂等等，现在继续仿照西法设立象邮政局这样的机构，也已经是时候了。”

“中国为了维持自己的体面起见，也应当开办邮政来满足这个需要，而不是让别的国家去办。”

（见《中国海关与邮政》第2—3页）

公元1885年由葛显礼主持翻译了香港邮政条规123条。由葛显礼的华文案森李圭兼任浙江宁绍台道薛福成的洋务委员译成中文抄送给薛福成。薛福成呈报给两江总督曾国荃，由曾国荃转呈给清政府，总理衙门分别向江海关道、总税务司赫德及南、北洋大臣等方面征求意见。

葛显礼的条陈主要包括：（1）外国“客邮”在中国沿江口岸任意设置，有失大国体面，应收回邮权，由中国自办。中国不办邮政，外国置邮是不得已的事情。日本没办邮政之前，英国才在日本置邮，从日本自办邮政后，英国邮政

自动撤退。中国自办了邮政，通知香港英国当局撤退“客邮”，英国一撤，他国也必关闭。（2）中国自办邮政莫如海关最妥善，因为各国最信服中国海关，由海关兼办邮政又可通晓各国语言文字，掌握各国来往船舶时间，办通信快捷，利用现办人员，不必另筹经费，利国利民，还可增加一笔收入。

这一建议很快得到清政府同意，总理衙门责令赫德试办海关邮政。

赫德取得试办海关邮政大权后，坚持一不要人，二不要钱，要求清政府皇帝正式“降旨”批准。总理衙门却考虑正式开办邮政，能否收回“客邮”，是否会伤害民信局而引起反抗，故迟疑不定。赫德一再表示，海关兼办邮政，绝不会伤及小民利益，也不会给驿站造成困难。直到公元1890年总理衙门才批示：

“所拟办法，既对民局无损，可将邮政推广（指试办海关邮局），俟办有规模，再请旨施行。”

就是在这期间，各国“客邮”不但没有撤退，还不断扩展，无法阻止。公元1892年南洋大臣刘坤一、北洋大臣李鸿章纷纷上书说：如不赶快正式办邮政，“异日中国再议推广，必要维艰”。赫德也说：“数年来创办艰难，若不奏请（皇帝）创办邮政官局，以为推广之计，恐将另生枝节。”公元1896年，南洋大臣张之洞又奏请开办国家邮政。广西按察使胡燏棻也上“创办邮政，以删驿递”奏折。其他如王韬、郑观应、陈次亮、康有为等也要求兴办邮政，公私兼顾，沟通中外联系。于是总理衙门根据张之洞奏折和赫德所拟邮章，奏

请光绪皇帝正式批准，于公元1896年3月20日（清光绪22年2月7日）“依议”开办了“大清邮政”。

赫德从公元1878年委派德璀琳试办海关邮政，到公元1896年由清光绪皇帝批准正式开办大清邮政，经过三十年的酝酿，从海关兼办邮政到海关试办邮政，到大清邮政创办。这漫长的岁月，赫德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才夺取了中国邮权。这种由外国人管理的邮政，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产物。

第二节 海盗通信

“客邮”是随英国鸦片贸易而来，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犯中国主权的产物，它是掠夺成性的。最早是英国资本家为了捞取大量金钱，而把鸦片当“商品”通过轮船运到中国倾销。就在他们走私鸦片的船上挂起信箱，以备来华英商通信之用。英国商务监督律劳卑于公元1834年无视中国主权，在广州驻所开办“英国邮局”，由伦敦英国邮政总局领导。就是这个邮局为贩运鸦片的快艇传递信息。曾任中国海关总署统计处秘书的美国人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上说：

“早年没有邮政便利。每个发信人或收件人都须依靠其本公司的船只或其他公司的便船。自然，每艘船都为所有的人携带信件，但是不属于本公司人们的信件，往往是在携带该信件的船只到达一、二个月，甚至三个月后，才交给收信人。把消息独占几天，甚至几小时，都有很高的货币价值，这是不能为了一点要帮助人的意愿，而随便冒险从事的。”

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海盗变本加利向中国倾销鸦片。为了抢先得到鸦片的行情，互相争先看到邮件信息。开始太平洋邮船只达香港，所有上海邮件，则由上海各大洋行各派小船特赴香港截取。这种小船争先恐后，为主子在营业上牟取暴利，而先窥本国市价信息。贩卖鸦片更争先要看到鸦片的行情信息。美国人马士说：

“香港已成鸦片的主要集散地……飞速的轮船带着抢先的消息，从加尔各答开到新加坡和香港，再从香港开到上海。它们还有为某一集团专设的邮政便利来运送邮件的准备，而且惯于把除了自己原主的信件以外的邮件，扣压24、36、48小时，或更多的时间……”

他们扣压邮件其目的是为了先掌握行情，以便兜售“商品”，使别的货主后接到行情而亏本。这些邮件不都是货主的，还有别人的信件，也同样遭到扣压。如英国海军上将开帕尔的信件就被扣压过。公元1843年开帕尔在日记中写道：

“匿名的鸦片快艇，从孟买到来，只带来船主人的信件，畜生！”（见《广州番鬼录》98页）

这种谩骂正好说明海盗式通信是为船主服务的，而不是便利于收件人。

第三节 “客邮”侵入与泛滥

（一）世界列强在华设“客邮”

公元1842年4月25日，英国侵略军头子璞鼎查在中国的香港，以“香港英国总督”名义发出通告，开办“香港英国邮

局”。公元1842年8月29日，中国被迫签订第一个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之后，英国以香港为基地，五口为前哨，在中国领土上任意开办英国邮局。五口开放后，英国政府即决定以派驻各通商口岸的英国领事为英国邮局代理人，设有“领事邮政代办所”，直属伦敦英国邮政总局领导。英国把邮局设在领事馆内，为其以外交文书许可由专差递送的国际惯例打掩护，昏庸的清朝政府对此没有异议，反而在《天津条约》中允许列强的外交文书“由沿海无论何处皆可送文”。

后来，各国竞相效尤，借口“利益均沾”，纷纷在中国设邮局。法国于1861年，美国于1867年，日本于1876年，德国于1886年，俄国于1897年，相继在上海设立了自己的邮局。十九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争夺更加激烈。从1856年英法联军侵华战争，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公元1904年日俄在中国的战争，直到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帝国主义在华开办的“客邮”更加泛滥。据不完全统计，各国邮局、野战邮局、代办所，多达三百四十余处，不仅设在中国沿海沿江通商口岸，还推进到内地与边疆，如新疆、西藏、云南、黑龙江等地。领头的是英国，数量最多的是日本与俄国。

1870年指鸦片战争后，1897年大清邮政开办之初，1906年日俄战争后，1913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1918大战末期到1922年仍有开办的。

各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客邮”其借口“中国没有邮政机构”，其实中国不仅有官办驿站，也有民信局和侨批局，通国内外均有邮局之设，只是不能运送他们与本国之间来往

外国在中国设立“客邮”统计表

国别	处	年份				
		1870	1897	1906	1913	1918
	英	2	8	14	14	20
	法	1	2	14	13	21
	美	1	1	1	1	4
	俄		5	5	18	119
	德		2	14	12	40
	日		7	17	129	140
总计		4	25	65	187	344

邮件。但从1896年清政府正式开办了大清邮政办理国际邮件后，客邮本应裁撤，反而大大增加，这就说明他们别有用心。美国驻华公使1920年4月20日向美国政府的外交报告中指出：

“各国曾在中国设置客邮，大要为政治原因，或为其对于中国之将来计划起见，以巩固其在中国之地位，或因嫉忌他们在华地位。但客邮之设立，并未得中国之允许，或竟忽视中国之意而不顾……此种设置实侵犯中国主权。”（见《交通史邮政编》第四册1339页）

这些“客邮”是帝国主义侵华的产物，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服务的。他们在中国领土上不遵守中国的邮章，而执行本国的邮章，不仅收国际邮件，还收中国国内互寄邮件，排挤中国原有的邮政。同时在收寄邮件时，不贴中国邮票，而

贴辨士、法郎、美金、日元、马克和卢布邮票，盖用他们本国文字所写的中国地名邮戳，按他们“国内邮资”收寄“国际邮件”，公然违背万国邮联章程和侵犯中国领土和主权。更为严重的是排挤中国邮局和从事贩卖毒品及其贩运走私物资活动。如德国在山东胶济铁路沿线，任意开设的邮局，由铁路带运邮件，公然拒绝带运中国邮局的邮件。法国把中国大西南视为他的殖民地，在蒙自、重庆、成都、贵阳等地私顾邮差组织邮路。各国来往邮件都用本国邮袋装运，不受中国海关检查，并以此为掩护，向中国倾销鸦片、吗啡、高根等毒品，并从中国盗买珠宝、珍贵文物，并进行钟表、首饰等走私活动。

(二) “客邮”的分支“书信馆”

各帝国主义在华普设“客邮”的同时，各租借地工部局及其外国投机商、冒险家也在中国境内开办以“书信馆”名义的投机倒把捞取中国财富的活动。

公元1863年上海租界工部局董事会成立的“上海工部局书信馆”，是最早的一家“书信馆”，有洋人局长、职员和华人会计、听差及信差，共计三十一人。这个“书信馆”在通告中宣称：通邮范围包括厦门、汕头、温州、福州、烟台、大沽、天津、北京、南京、镇江、芜湖、九江、汉口、宜昌等广大地区。他们依靠轮船代运和托捎代转邮件，不是以通信为主，而是推销邮票为业，以大发横财。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这种“书信馆”相继在汉口、烟台、重庆、九江、芜湖、镇江、宜昌、威海卫、厦门、福州、南京等地泛滥，有的叫“工部局书信馆”，有的叫“工部

邮政局”，有的叫“宜昌书信馆”，有的叫“Local Post Office”（本地邮局）等，他们都打着通信的招牌，大搞邮票投机生意。他们故意印制发行“变体”邮票，专门制造“改值”、“颠倒”、“重印”等怪异邮票，以牟取暴利。如1893年12月重庆有一家洋商叫“利川公司”，办了一所“重庆邮局”，经理利得尔向上海“别发公司”打印普通、加盖与变体邮票多种，公开出售。1940年他们卖的集邮邮票，低的每枚美金二分，高的每枚美金二元二角五分。1894年6月，宜昌英国领事以“外交官”身份，召集“外侨”成立了一个“宜昌公共事业促进会”，开设了一个“宜昌书信馆”，向日本订制了大量邮票，获取暴利，他们用邮票收入，改建了宜昌港口设备，修建了一个大型俱乐部。1894年7月，有个叫葛雷森的外商，在上海外文《字林西报》上刊登“通告”说：

“我葛雷森，从本月一日起，我委派我自己充当芜湖本地邮局局长，此告。”

这个自封的局长葛雷森，大量印制发行多种邮票，出售给集邮爱好者，从中牟利。

“书信馆”是外国人在华开设的“客邮”分支，所不同的“书信馆”以外商或团体举办，“客邮”以官方出面开办，其实质与目的是一致的，明抢与暗偷，“书信馆”是“客邮”的变种。“书信馆”以邮票牟取暴利，引起集邮爱好者的公愤，纷纷要求取缔集邮协会，揭发“书信馆”骗钱行径，不许把“书信馆”发行的邮票列入集邮票目录。鉴于“书信馆”原形毕露，大清邮政在美国人赫德主持下，于1897年11月1日接管了“上海工部局书信馆”。其他各地